

回返记忆中的母校与生命认同

——一群上海圣约翰校友的叙说

陈祥美*

(台湾圣约翰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 新北, 25162)

摘要 本文藉由生命史材料探究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友对母校教育内涵的认识, 圣约翰的学习经验对他们人生发展的影响, 以及校友对“复校运动”的认同。上海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较早成立的教会大学, 几近全英文的训练, 在中国培育了许多外交、商业人才。圣约翰大学被裁并已过一甲子, 如今仅存的校友皆已垂垂老矣; 回望一生, 他们无不缅怀当年在上海圣约翰的校园生活。研究发现, 校友均认为: 良好的英语训练促其提升国际接轨能力, 通识与品德教育陶冶品性与人格气质, 体育运动锻炼强健体魄与奠定健康基础。“圣约翰精神”涵化于“大樟树”意象以及“光与真理”的校训, 进而聚集了校友的认同感与凝聚力, 并将复校的悬念具体落实成为校友生命中的集体认同。圣约翰大学的学习经验成为校友重要的人生资产, 并形塑校友作为国际社会的精英份子。

关键词 生命认同 生命史 上海 圣约翰大学 教会大学

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是中国较早成立的教会大学, 也是唯一保有洋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以下简称圣约翰)除秉持西方教会办学的精神外, 由于地处上海, 更融合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强调几近全英文的教学环境, 在中国培育了诸多外交、商业领域的专业人才。创校130余年后的现在, 仅存的校友皆已垂垂老矣。回望一生, 校友无不缅怀当年在圣约翰的校园生活以及学校教育的影响。每两年一次的全球校友会更吸引着他们从世界各地奔来, 分享个人人生阅历, 回溯共同的生命记忆, 还有念念不忘的复校计划。

本文藉由生命史材料, 包括: 圣约翰校史、校友的回忆录、校友访谈的叙事资料等以捕捉圣约翰的风华。探讨内容有: 一、在校友心中母校的教育内涵是否蕴含深切滋养其发光发热的肥沃土壤? 二、究竟是什么样的精神, 让这一群校友愿意拖着老迈的身躯千里迢迢地赶赴聚会? 三、校友悬念在心为圣约翰所做的复校努力。最后, 说明校友以复校作为集体使命的重要生命认同。

1 圣约翰经验与学习对人生发展的影响

1.1 良好的英语训练提升国际接轨能力

晚清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设立了诸多的教会学校, 圣约翰独具特色, 尤其是独树一帜的英语教学, 成就其“东方哈佛”的名声(石建国, 2009)。叶文心(1990/2012)指出圣约翰的创建即在于教会为了宣扬基督教义, 采“直接宣教抑或通过教育?”; 并以

“究竟应该采用中文还是英文作为教学语言?”为命题的宗教与世俗冲突争辩中发展。山东齐鲁大学的狄考文曾经对“以英语作为教会大学教学语言的选择”提出质疑, 他认为当时的年轻人深信学习英文可以带来财富, 他们疯狂地学习英文。然而, 如果一开始就在课程中设英语, ……学校就会迅速地世俗化, 将会与学院存在的目的背道而驰。然而, 圣约翰的传教士却已意识到语言作为思想载体的重要性, 语言本身自然也反映着某种观念与价值, “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决定, 即便可能引来外界诸多的挞伐, 但他们深信圣约翰的学生日后必将本着卓越的英语能力而有所成就, 且引以为傲(杨慧林, 2007)。

陈鹤琴说: “到了圣约翰, 所用的课本除国文外, 都是用英文的。理化算学历史都用原本”(徐以骅, 2009)。在校园中“全部课程(包括中国历史)已基本用英语教授, ……学校几乎所有的章程、规则、通告、往来公函、会议记录、年度报告均使用英文”(徐以骅, 1999), 进入圣约翰校园俨然像到了外国大学一般。周有光回忆: “校园语言用英语, 一进学校, 有如到了外国, 布告都用英文”(熊月之, 周武, 2006); 潘序伦也一样地印象深刻, 他说: “同学间相互交谈也是用英语, 教师讲课更不用说, 不论中国或外国教师全是用英语”(徐以骅, 2009)。即使是1946年以后, 学校的布告有了中文, 对师生而言, 英语却早已成为生活语言。解放后, 即使学校在教学上英语的使用已有大幅的变化, 但仍是主要的沟通工具。校友回忆当年: “师生只要踏进校门一定要用英文交

* 通讯作者: 陈祥美。E-mail: hmchen@mail.sju.edu.tw

谈,绝对听不到其他方言、其他语言,全部英文交谈”。圣约翰以英文作为学校生活语言的学习与训练,吸引了学生、家长与社会的青睐,学生毕业后的谋职“主要是得益于良好的英文知识”(沈鉴治,2006)。

外界对教会学校的主要批判为:以基督教思想融渗于教育,此被严重指责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主要手段。顾维钧说:“教会学校培养中国人的目的不是出自中国国家的需要,而是出自满足教会活动的需要。他们在普及教育方面所愿意做的工作主要是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为个人谋生做好较好的准备,而未顾及或根本未意识到整个国家的需要和要求”(徐以骅,2009)。圣约翰更因英语教学而备受责难,民族主义者评击其崇洋媚外,被异族掏空了心与脑,他们认为“舍弃民族语言,无异于民族自杀”,甚至于“只要学生仍受纯粹英语教育,或他们母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的教育,连他们的思想也会变得不伦不类”(徐以骅,1999)。即使对英语教学与训练有着诸多批评,校友们的实际经验仍然肯定圣约翰英语对于他们一生重要且正向的影响。

林语堂说:“圣约翰对于我有一特别的影响,令我将来的发展有很深的感染力的,即是它教我对于西洋文明和普通的西洋生活具有基本的同情。……同时,这基本的西方观念令我自海外归来后,对于我们自己的文明之欣赏和批评能有客观的、局外观察的态度”(林语堂,1974)。关于学校教育对于批判性思考以及人生发展的影响,周有光回忆当年在圣约翰图书馆与英籍老师的际遇与影响:“图书馆里有很大的看报房间,有着各种外国报纸,看报时有位年轻的英国老师问我们:‘你们看报怎么看的?’我们说‘看报就是看报,我们不懂什么叫看报’,他说:‘看报有方法,他说看报的时候,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的消息当中哪一条最重要?第二,要问自己为什么这条最重要?第三,还要问自己,这条新闻的历史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你到大学(图书馆)里面去查’。我们就照了他这个办法来看报,这样子看报就完全不一样了!觉得人就跑到事件里面去了!否则我在事件外面看报,所以生活的方法、思想的方法跟中国完全不一样,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西式的教育与英语教学带来思想观点的转变,校长卜舛济当年给圣公会的报告,决定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及训练的重要信念,相信着“华人研究英文犹如西人研究希腊拉丁文,可以增进智慧”(徐以骅,1999),以英语教学作为学习的环境确实让学生的思

考观点有了不同以往的转变,并启发与丰富知识的探索。

英文能力的养成与训练也使得圣约翰校友展现得天独厚的机遇,并与国际化直接地接轨。张仲礼感念圣约翰的英语教育提供其后续专业学习的重要基础,他说:“圣约翰的英文学习和训练,给我出国和留学带来很大的方便,可以直接进入专业学习阶段”(熊月之,周武,2006);谭欧惠群直言:“一到这里(美国)来,我英文已经讲的很好,念书也比较容易,做事情去 interview 也很容易,因为我英文讲的很流利”;因政局动乱未及大学毕业,辗转香港后到美国的凌节生说:“到香港后我到泛亚通讯社,泛亚是最早的一个 Asian for Asian news,后来我到韩战去做了短期的战地记者。因为之前我在香港曾采访一个联合国的高阶官员,他就说‘你要不要离开香港?’我当时年纪轻,二十一岁就进联合国工作”。校友的英文优势,使其不仅在继续深造学习上奠定良好的基础,毕业后也能藉由英文优势谋得体面的工作及相对的高薪。此外,因应国家需要而参与外交工作的黄耀清说:“五二年八月。我们圣约翰英语系的学生,参加北京召开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那是国家为了打开国际关系,举办的国际人民外交活动,需要大量的英语外语翻译人才。…教育部指示我们学生到北京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秘书处报到,分配到各个部门做翻译”。普遍说来,校友们都相信圣约翰的英文教育与学习经验成就他们一生的荣光。

在中国时局动荡不安之际,圣约翰校友挟其优越的英语能力作为移民或前往西方世界的通行证,在欧美国家落地生根并成为富商大贾,也在侨界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如何兆丰,容永道,欧德强等人),这些人后来也都成为“约大海外校友会的骨干,并且分享经由他们不懈努力而保留下来的约大永久资源”(沈鉴治,2006)。许多圣约翰校友对中国时局与民生福祉做出诸多重要的贡献,例如:政治方面的施肇基,顾维钧,严家淦,俞鸿钧等人;经济方面的刘鸿生,荣毅仁,吴舜文,经叔平等人,其他各专业领域均不乏其人。事实显示,前述许多对圣约翰办学的质疑与批判,一一被推翻,无数校友在中国社会成为国家栋梁,坚守专业岗位,让动荡的中国在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等方面得以正常地运作。

1.2 通识与品德教育陶冶品性与人格气质

圣约翰非常重视通识教育,《约翰声》的一篇评论就提到:“本校之宗旨,在使学生有广博之自由教

育,先使学生对于英文文学,有彻底之研究。然后授以科学,使之明了真理,以增进人类之幸福”(熊月之,周武,2006)。在课程设置与管理方面,采取文理贯通、交叉的模式,照顾到文科生与理科生客观的基本差异,注意提高文科生的理科程度以及理科生的文科程度。特意在文科中设置一些理科课程,同样地在理科中设置一些文科课程,并且鼓励学生跨学科兼修,藉以帮助学生建立知识的基本结构,增进学生的人文素养与关怀。陈耀生回忆圣约翰的教育,认为学校“强调品德教育,重视通识教育,以及对人全面的教育,除了知识要广泛之外,品德要好,落实德、智、体、美四育,就是现在所说的通识教育”;他进一步提到:“我念化学(系),记得那时候选了法文、德文、还有心理学,也选了许多我自己喜欢的横跨求知(通识)的课程。这对我后来的就业、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张仲礼也说:“广泛地涉猎各门课程,给我打下了比较广泛、扎实的知识基础,形成了比较开阔的学术眼界,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和社会工作都有很大帮助”(施扣柱,2009)。

当年学校强调的通识教育,虽然也被批评对于就业没有直接的帮助,但是陈耀生、张仲礼的说法,印证除了专业与英文的优势下,通识教育与品德教育对其后来的生涯发展产生潜在与重要的影响。

1.3 首度将体育及运动竞技引入中国大学校园,锻炼学生强健的体魄

将体育引入大学校园,圣约翰可说是领风气之先,早在1880年代中期圣约翰就已引进兵操并将之列为必修课。1890年举办第一次的校内运动会,也是中国学校的第一次。此后,棒球、板球、篮球、田径、网球、足球、击剑、羽毛球等等,圣约翰都率先引进(熊月之,周武,2006)。

校友回忆学校的生活,总以为体育活动是一大特色。校内的体育设施完善,还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足球队。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回忆说:“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还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哩”;在“优美的环境里度过愉快的时光”,“学打棒球,练投上切球和下切(坠)球,骄傲的是我写下一英里赛跑的全校纪录,又参加远东运动会”;他特别强调“如果说圣约翰大学给了我什么,那就是健康的肺”(林语堂,1980)。第一届的远东运动会中国26名选手所得的36分中,26分为四名圣约翰学生所得;沈嗣良担任副校长时(曾历任体育部主任)亲自募款带领学生参加1932年及1936年于美国和德国举办的奥运会,更为圣约翰打响名号(徐以骅,韩

信昌,2003)。

对于体育的深刻印象,涂继正说:“运动啊,叙述圣约翰的历史呀!圣约翰大学对中国的体育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梁世伟深切地回忆:“在St. John's的时候,我参加运动社团,当时打篮球校代表队,上海的高校联赛,圣约翰大学都是名列前面”;忆起校园玩伴组织运动队伍(棒球队)的郑大卫说:“蒋××他组织了棒球队,叫神鸟队,圣约翰的小鸟一样,在上海市棒球比赛得了亚军,实际上教练是李××他爸爸,他爸爸是专门的体育教授”;他继续说着:“圣约翰出了好几个国手,像桌球陈××、篮球的卢××、女生陈××等,52年以后把他们调到北京体育学院。随着国家到比较友好的国家去培训,培训以后在中国国家代表队在国际上比赛成绩也不错”。圣约翰的运动及体育教育,自有其历史渊源及传承的风气。如圣约翰与上海交大的足球赛,往往在上海引起讨论。这些运动风气与精神,常能潜移默化地影响校友,经由学校对体育活动的重视,强化了校友的健康并带给他们长寿的基础。

良好的英语教育及西方思考训练,促使校友具有国际接轨的能力、藉由通识课程的强调陶冶了品性与人格气质,以及重视体育活动锻炼强健的体魄奠定健康的基础,这些圣约翰的校园学习经验成为校友重要的人生资产,影响他们日后在职场以及生命发展的重要基础,并形塑他们作为社会的精英份子。

2 圣约翰精神

2.1 校园建筑的主要象征与指标——S. Y. Hall 与大樟树

由于院系学习场所的不同,或是走读与住读的差别,校友对于校园回忆有所差异,普遍印象深刻的主要有S. Y. Hall与大樟树。S. Y. Hall系中国教会学校最早的中西合璧式的建筑结构,严停云在《智慧的灯》这本小说,一开始便提到:“春风,吹拂着上海市一所最高学府的钟楼。这栋楼高高耸入空中,好像这学校的首脑,……我们这蚂蚁样,熙来攘往在钟楼底下的年轻的一群”(华严,1980)。这里所描绘的钟楼就是上海圣约翰校园的主要建筑——“怀施堂”(S. Y. Hall),此为纪念创办人及首任校长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主教而设,S. Y. Hall是校友对于母校建筑的主要记忆之一,取自施约瑟Schereschewsky的第一和最后一个字母。

大樟树(camphor tree)是圣约翰校园最重要的

象征,也是“校园里的一个标志”,它是校友访谈中对于校园回忆最为立即与重要的描述,他们怀念着“那棵陪伴着我们度过晨昏的大樟树”(华严,2011);高涛不禁赞叹:“camphor tree 面积大的不得了!上面全部是浓浓的叶子,下面的树根离地大概一尺半,很长很长,上面大概可以坐一、二十个人,晒不到太阳、淋不到雨,很多人都选到那边去见个面、讲几句话”。校友们在这棵大樟树下拥有许多的回忆,住在校舍的约园子弟涂继正记忆清晰地说:“我看到那些男男女女在大樟树下卿卿我我的,我可以看见并乐在其中。因为就在我家门口,看出去就是大樟树”。可惜,这棵树已经死掉了,据说大樟树是因树龄太老自然死亡;另有一说是大樟树在50年代末因苏州河泛滥,导致树根部分枯烂,1962年因无法救治而被砍伐(徐以骅,2009);“还有一种说法是在‘文革’中被砍掉作了木材。不管是怎样,当1952年圣约翰大学遭裁撤之际,大樟树实际上在精神上已经死亡了”(沈鉴治,2006)。时至今日,大樟树即便不在,但大樟树的记忆早已深植在校友心中,并与其他诸如校训等意象共同传递着圣约翰精神。

2.2 圣约翰“光与真理”的核心价值与精神

在校友心目中,圣约翰的精神永远是鲜活的,并未曾消失,这些对母校的深情长谊,已然汇聚成一种历久弥笃的情结(熊月之,周武,2006),校友们所感受到母校教育的影响,更可谓是一种圣约翰精神的具体展现(徐以骅,2009),某些校友谓之为圣约翰效应(St. John's Effect)(见上海圣约翰大学史料电子书:东方哈佛 1879-2009,简称“约史电子书”)。

校友们所感念与追寻的“圣约翰精神”究竟是什么?这是一种“说也说不清的认同感”;“许多人对学校都蛮有感情的,在美国的时候,我们有个CCUAA(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校友会),许多校友会也很活跃,可是我们(圣约翰)人最多!但是我们学校比较小,我们同学现在还在World Reunion,他们老早就没有了!那他们就觉得奇怪?为什么?”。相对于其他同样在当年被裁并的教会大学的校友同学会而言,都因着校友的逐渐老逝而停办。但圣约翰的校友普遍性地认为:“我还活着的话,可以走路,我一定去的,这个是Saint John's精神;我们都关心,八十多岁了每次一开会,可以走的人都会来的,这个就是Saint John's spirit”。他们关心着这聚首不易的机会能否再次见到当年的同窗老友,也关心着跟圣约翰这个学校有关的事情。

圣约翰对于校友的影响体现在各个层面,其中

融合性地诠释与实践中西校训最被强调。校长卜舫济认为:“在美国最古老大学之一的图书馆的大门上,人们可以看到希伯来语‘Urim’和‘Thummim’,即‘光与真理’。显然在学习方面没有更好的格言了,我们也没有比使圣约翰大学成为中国光与真理的灯塔更高的目标”(圣约翰大学同学会,1930)。1894年圣约翰正式以“Light & Truth”(光与真理)为校训,一般认为圣约翰是中国最早制定大学校训的最高教育机构(陈功江,2011)。校友对校训及其涵化的精神有着各自的解释,认为这是一种:“真理知识的追寻;照耀他人与服务的精神”。此诠释可回归于校歌“Light & Truth”中三节大意所指明的追寻光明、寻求真理、服务使命以作为生命实践的涵意与精神(见“约史电子书”)。

中文校训则来自论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1931年因教育部收回教育权运动而规范教会学校立案,内容规定要有中文校训。卜舫济企图通过儒家文化来强化基督教义,他特别推崇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将之定为圣约翰大学的中文校训(陈功江,2011)。严倬云特别提到:“在圣约翰的日子,影响了我一生的行事为人,我牢牢记着圣约翰的校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徐以骅,2009)。

或者是“光明就是道路,做人一定要坐的正,站的稳;基督教的精神就是要排除一切困难都要往这个真理走,……死读书没有用,要学要思。这就是中西价值与文化的融汇,圣约翰精神也就是来自于中西文化融合的一个特殊环境”。此外,像是“3F—Fraternity, Fellowship, Friendship”(学谊、联谊、友谊)等精神的涵化也常被认为是圣约翰精神的重要指标,藉以落实于“知识学习的探究与分享、校园生活的参与及联系、情感友谊的经营与维持”。

关于校友的各自表述,徐以骅(2009)综合并认为圣约翰精神可从几个点加以理解:一、绅士风度及淑女风范,诸如秩序、守时、洁净、勤学等礼仪及德性的养成教育,其为一种历久不衰又难以名状的气质;二、“3F精神”,特别是校友会所体现的圣约翰传统,维系着学校与校友的精神枢纽,并倡议母校精神;三、“三自品格”,即自修、自立、自治的品格养成,作为持续与终身学习的价值与展现;四、社会服务,培养对国家、社会服务的教育期许,也是作为圣约翰精神的最高体现。这些堪称经济富裕、健康的校友,对母校精神的惦念,直觉地认同其核心价值与精神,发展并引导出校友的生活价值,共同商讨复校,从起心

动念进一步化作生命实践。

3 失而复得的母校

3.1 复校的悬念:失落的上海圣约翰

对于失落的母校是否就将只是记忆或是仅作为一种怀旧的情愫而不再成为现实?约翰人的集体记忆在已改变的社会现实中是要彻底的接纳消失的现实或是对保存的母校记忆成为一种新的重构的实现(蔡辰梅,刘刚,2009)?

1952年新中国政府开始对高等院校进行调整,包括圣约翰在内的所有教会大学被裁撤,圣约翰各院系被调整到不同的高校,圣约翰正式走入历史。1954年东吴大学、1961年辅仁大学陆续在台湾复校,看着其他教会学校在异地复校的具体成果,圣约翰的复校一直是校友关心的议题,尤其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圣约翰的校友念兹在兹。对于在上海复校可能性的试探与请教,校友们透过各种管道与努力,但80年代末上海政府的表态,“一口把圣约翰复校的可能堵死了”(见“约史电子书”),上海校友极力想办法以圣约翰或 St. John's 谐音“申江”或是“约友”为名,尝试作为上海复校的可能性,办理一些英语补习学校(沈鉴治,2011)。然而,就现实而言,上海原地复校虽是所有校友的共同愿望,但也是最不容易的(见“约史电子书”),其阻碍除了包括一般教会大学的复校难度(教会大学是帝国主义以教育的形式“从事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等定调);现有华东政法大学既有校舍、校产、资金、设备、人才等资源的重新分配,除了既得利益与切身利益之外,更增其复杂性与阻碍。此外,恐怕尚有校产归属的问题(黎望复,2006)。

90年代末期,中国各大学兴起扩大的风气,华东政法大学也风闻要搬离原址另建大学城,有圣约翰校友想趁机买下原址;或是另寻他址复校,纵使庞大的经费预算已有眉目,但上海复校的计划,终归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沈鉴治,2011)。

3.2 异地复校:UBC St. John's College 与台湾圣约翰科技大学

上海原地复校遇阻,无法继续前行,其他海外的校友只能为筹得的款项另寻用途。1997年间大批港人移民温哥华,经校友会协商,2000年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支持下于该校成立专为研究生而设的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设备与师资全部由UBC提供。有的校友认为:这是自从1988年校友会决定复校以来“一个初步与具体的成

绩”(沈鉴治,2011),诚然虽母校不能在中国大地上重现,但这已是复校的第一步,故这所学院得到不少校友支持;圣约翰学院也以“光与真理”及“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作为校训。但部分校友却心有遗憾,感慨地说:“虽然那里用了圣约翰的名字和校训,但毕竟只是一栋宿舍楼而已,并不是一所真正的大学”(见“约史电子书”)。除了并非一个完整的教育机构外,非上海、非华人地区的“复校形式”仍然是校友心中未能释怀的心事。

其实,早在1967年台湾的圣约翰校友,为了延续圣约翰的办学理念与精神,原计划以“圣约翰大学”在台复校,唯当时台湾“教育部”暂不开放新设大学,仅开放专科学校的设置,为配合当时经济发展之需要及政府教育政策之要求,故结合圣玛利亚女校的校友,成立“新埔工业专科学校”,英文校名则为 St. John's and St. Mary'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一位童年曾在上海圣约翰校园生活,1959年起到台湾宣教,对于新埔工专的创建也不遗余力的葛培根牧师说:“我来到台湾时,即听说校友们要复校的事情,就我了解,校友们希望教会办理复校,是对教会的支持,也希望自己的子弟可以就读于这所质量高的学校,可以得到和自己一样的教育内容”(陈玉海,2008);曾念约中并且也是约园子弟的郑戴维直说:“复校的精神,我们不是说自己享受过了就算完了,我们的希望能…更传承(下去)”。1993年,新埔工专增设商科,学校奉准改名为“新埔工商专科学校”,1999年再改制为“新埔技术学院”。此际,校友会即开始酝酿正名“圣约翰”。

2003年10月10日正式更名为“圣约翰技术学院”。当时的校长杨敦和说:“正名相当艰辛,不只向外要找‘教育部’争取,向内还得争取并说服入学、毕业都是‘新埔人’的校友同意更名”。推动正名之初,许多1970年代以后的新埔校友,已经不清楚复校始末,认同自己是“新埔人”,并认为“学校又不是办的不好?出去的校友表现也不错,怎么突然要改名?”学校一再说明原委,并由新埔校友出席上海圣约翰校友会,才了解并认识上海圣约翰过去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力,慢慢接受更名的想法。然而,许多圣约翰校友在等不及新埔正名,香港校友会就联合美加校友会,在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内设置“圣约翰学院”,作为东方文化研究中心,这种动力也让反对正名的新埔校友印象深刻,化解反对意见。

2004年第六届全球校友联谊大会以热烈掌声通过了认可台湾“圣约翰技术学院”为圣约翰继承

者的决议。2005年“圣约翰技术学院”升格并核准改名为“圣约翰科技大学”,英文为 St. John's University,并计划朝向恢复“圣约翰大学”为努力之最终目标。一位从美国多次返回台湾参加校庆活动的圣约翰校友欣慰的说:“不管台湾将来走向如何,圣约翰大学总算可以在一个说汉语的地方复校了,这对我们校友来说是一个安慰”(见“约史电子书”)。对于这些耄耋之年的校友们而言,期勉圣约翰科技大学的发展更多在于:“你们能够把圣约翰大学再搞起来,我们作为老校友,这是很开心的事情”。

然而,对于复校的实质意义,不管是对于加拿大的圣约翰学院或是台湾的圣约翰科技大学,若以当年圣约翰的声誉、传统,抑或是未来在上海即使能“神形兼备”全方位的标准完成复校目标,都将无法再现圣约翰昔日的辉煌;更何况当年圣约翰的办学与模式也非一成不变,历经了多年的转型与重新定位,其地位也不是一蹴可及的。校友对于“学校不再”与“复校”的失落心情是否能转换接受一种生命的再生形式与实质展现?现实上,校友若能把“后圣约翰”的教育机构视为圣约翰精神的传承而加以支持,实为一种近乎情理的选择(徐以骅,2009)。

4 结语:一种铭印在心的集体生命认同

盛大的校友会上,分明都见到她的绿荫,笼罩了大厅。她那粗长的手臂,伸过高山、海峡,把每位校友变作她的叶子——一片片柠檬香的绿叶。饱含友情的芳馨,哦,老友,随我来吧!沿着雪化的小径,同去久违的校园耕耘。张起樟树的华盖,重铺草坪的绿荫,播下深沉的爱,使我们的人生返青。(“约史电子书”王于之《老樟树》)

近20年来,圣约翰平均每两年一次举办世界校友大会,2013年的11月将在台湾举办第十届的世界校友大会,预料来自世界各地数百名校友将会前来参加盛会。每次校友会的凝聚活动,校友们同唱校歌并大声喊出校呼“college yells”,喊起“bonbon bon”的口号(见“约史电子书”);都让校友一同回忆在圣约翰度过的美好时光以及这段求学经历对其人生的帮助(饶玲一,2010),这种共同的怀旧在于寻找一种家园感,并在寻找的过程中,获致心灵的补偿(蔡辰梅,刘刚,2009)。

从复校运动及校友的世界同学会,可以明白:“对他们来说,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们都为自己作为圣约翰大学的一员而感到自豪”(沈鉴治,2006)。这无非就是他们不辞千里,拄着拐杖、推着轮椅、拖

着老迈、纤弱的身子赶赴会场相见的重要精神。而校友踊跃地参与复校运动,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见到在华人地区的复校实质进展,作为心理的慰藉。复校运动让消失的母校得以复见,这些举措将使其生命中精华的青春岁月能够重新召唤出来并被看见。此记忆的唤起,即是一种内心深处意义归属的需求,并反映出自我认同议题。关于这些“我们是谁”的追问,牵涉到自我认同的社会层面,即为社会认同或集体认同(蔡辰梅,刘刚,2009)。故以圣约翰为名的“复校”不仅是解开这尘封记忆的线索,更使得“复校”的使命成为集体认同进而填补其个人生命岁月中自我认同的空隙。

在圣约翰校友的自传、回忆录中,我们看见其清晰地描述圣约翰生活的重要情节,记述着当年的人、事、地、物(沈鉴治,2011;施台凡·舒曼,2008/2011)。我们知道这些鲜活的生命故事就是他们在人生发展中的、深刻地内化了的、不断展开的自我叙事,就传主群而言其实就是他们重要的“人生阅历”。集体记忆是一种具有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回忆,这些集体记忆中内涵着一种凝聚力量、群体共有的信念和态度,并作为集体认同的前提(蔡辰梅,刘刚,2009;曾武清,2004;Halbwachs,1980,1992)。正如同他们在忆说共享的母校经验过程中,这些生动的、关键的情绪体验,即已成为解决他们自我认同的生命片段(Singer & Salovey,1993)。

McAdams(1988)提出生命故事的认同模型(life story model of identity),认为人在青少年后期和成年早期就开始建构和内化综合性的生命叙事,并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致力于成就这些故事。我们见到圣约翰校友归结了学校教育对其一生的巨大影响,而后续的努力及奋斗正是他这一生在不同的挑战中适应与创造的历程,校友将成功归结于启发他一生发展的大学生活,并在此寻回他们重要的生命认同。

参考文献

- 陈玉海.(2008). 宗教与世俗之冲突与妥协——以圣约翰科技大学创办历程为例 台湾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陈功江.(2011). 精神符号与个性彰显——民国时期知名大学校训研究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蔡辰梅,刘刚.(2009). 论教师的集体记忆与自我认同. 教育学报, 5(5): 89-97.
- 华严.(1980). 智慧的灯 台北:跃升文化出版公司。
- 华严.(2011). 回梦约园:揭开《智慧的灯》的面纱 台北:跃升文化出版公司。
- 黎望复.(2006). 推动索偿运动在大陆实行——财产权是最重要的人

- 权. 北京之春, 153, 22 - 26.
- 林语堂. (1974). *无所不谈合集*. 台北: 台湾开明书店.
- 林语堂. (1980). *八十自叙*. 台北: 远景出版公司.
- 饶玲一. (2010). 从“同年”到“同学”——圣约翰大学校友会与近代中国社会新型人际网络的建构. *史林*, 6, 141 - 191.
- 上海圣约翰大学史料电子丛书. 东方哈佛 1879 - 2009. 2013 - 09 - 03, 取自 <http://ssju.looktoronto.com/textfr.html>.
- 石建国. (2009). “圣约翰模式”述论. *世界历史*, 196, 92 - 105.
- 施台凡·舒曼. (2011). *最后的避难地: 上海(索卡尔和杨珍珠的爱情故事)* (李士勋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施扣柱. (2009). *青春飞扬—近代上海学生生活*.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 沈鉴治. (2006). 圣约翰大学的最后岁月 (1948 - 1952). *史林*, 92 (增刊), 11 - 15.
- 沈鉴治. (2011). *君子以经纶—沈鉴治回忆录*. 香港: 三联书店.
- 圣约翰大学同学会. (1930). *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 1879 - 1929*. 上海: 圣约翰大学同学会.
- 熊月之, 周武. (2006). *圣约翰大学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徐以骅. (1999). *教育与宗教: 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 珠海:

- 珠海出版社.
- 徐以骅. (2009). *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 - 1952)*.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徐以骅, 韩信昌. (2003). *海上梵王渡—圣约翰大学*.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 杨慧林. (2007). 早期教会大学的两种授课语言及其价值归宿. *中国文化*, 24, 36 - 38.
- 叶文心. (2012).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 - 1937)* (冯夏根, 胡少诚, 田嵩燕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曾武清. (2004). 虚拟社区的集体记忆与仪式传播: 一个关于“龙魂不灭”的初探性研究. *资讯社会研究*, 6, 199 - 234.
- Halbwachs, M. (1980). *The collective mem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 Halbwachs, M.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cAdams, D. P. (1988). *Power, intimacy, and the life story: Personological inquiries into identity*. New York: Guilford.
- Singer, J. A., & Salovey, P. (1993). *The remembered self: Emotion and memory in person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Returning to the Alma Mater in Remembrance and the Life Identity: Alumni of St John's University in Shanghai and Their Narratives

Chen Hsiangmei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St. John's University, Xinbei, 25162)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alumni of St. John's University in Shanghai through their life history how they comprehended the alma mater's educational missions.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s at St. John's had such dramatic impacts on their lives and their embracement of St. John's "restoration movement" was whole - hearted.

St. John's University was a Christian university that was founded very early in China. It's nearly all - English training had nurtured many distinguished diplomats and finance professionals for China. Yet about 60 years ago, St. John's was faced with re - structure, faculties were merged with other universities. Its alumni from then are now reaching a very good old age. Looking back, they all find their young and scholarly days at St. John's the best memory of all.

My research finds that these alumni believe excellent English proficiency connected them with the global community. Also, general and moral education at St. John's shaped their personality and temperaments in an admirable way. St. John's emphasis on physical education also laid a sound foundation for their good health. St. John's spirits, manifested in the image of Big Camphor Tree and the motto of Light and Truth, further summoned their identity as well as cohesion. Therefore the restoration, or re - establishment, of St. John's had been actualized and become their 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nutshell, learning experiences at St. John's had become one of their most significant life assets, and further shaped them to be international elites as such.

Key words life identity, life history, Shanghai, St John's University, Christian universities